

崧泽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方向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浙江杭州 310014)

内容提要:崧泽文化出土玉器的形制和种类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普遍特征;宁镇和古芜湖地区玉器的地位与意义,值得研究者关注;苏南-沿江地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的玉器是传播还是传承,也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崧泽文化晚期的玉器可能还有我们未认知的一面,深入研究瑶山、反山早期玉器可以获得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崧泽文化 玉器

中图分类号:K871.13;K876.8

文献标识码:A

崧泽文化以1957年发掘的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命名,是环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向良渚文化过渡的重要考古学文化,据对多个典型遗址单元的测年,绝对年代约距今5900~5300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曾一度统归为土著性的青莲岗文化,随着青莲岗文化渐渐不能包含从江淮到太湖流域这一广袤的地区,进而又提出了青莲岗文化的江北、江南类型,并将江南类型分马家浜期、北阴阳营期和崧泽期。1977年夏鼐先生将江南类型命名为“马家浜文化”,包括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两个阶段。虽然1977年南京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大体达成了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历经“马家浜-崧泽-良渚”三个基本发展序列的认识^[1],但是,如果说1959年从龙山文化区分出来的良渚文化命名与1956~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发掘有关的话,同样以1958~1959年浙江湖州邱城、嘉兴马家浜遗址和1957年上海崧泽遗址为代表的发掘而命名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命名却迟了近二十年,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世纪之交,崧泽文化的田野考古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尤其是1996年嘉兴南河浜遗址的发掘,92座崧泽阶段墓葬以及其他丰富的生活遗存,“两期五段”被认为贯穿了崧泽文化的始终^[2];2004年前后浙江海盐仙坛庙、湖州昆山、长兴江

家山以及江苏苏州同里等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崧泽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浙西北以随葬粗泥陶质三足盃和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崧泽墓葬与良渚遗址群随葬夹砂鱼鳍足鼎的早期墓葬通过彼此共出的形态一致的假腹圈足盘连接,昭示了作为良渚文化中心遗址——良渚遗址群崛起的踪迹。

关于崧泽和良渚考古学文化属性的甄别,有“过渡阶段”之说^[3],也有过尝试单独命名^[4],笔者曾很认同中村慎一关于以夹砂陶质鼎的出现作为标志的见解^[5],虽然在浙北地区的考古实践中,已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生活实用和墓葬随葬陶器在质地形态上的截然不同的现象。

东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器是当时精神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复杂高端制作技术的集中体现,主要以琮、璧、钺和神人兽面像刻纹为代表的良渚玉器是良渚文化的主要代表,其种类、矿物材质、配伍、数量、质量(主要是刻纹“纹样规范、细致”、雕琢技术)等是衡量聚落和聚落群的等级、墓地中的等级的重要标准,而作为承前启后的崧泽文化在玉器上的体现也能准确反映考古学文化的变革和更替。所以,从宏观上把握崧泽文化阶段的玉器非常必要,同时,作为宁镇和古芜湖地区的约当于“崧泽-良渚早期阶段”玉器的背景以及透过良渚早期玉器所反映的现象等等就更需要研究者深入地关注。

一 崧泽文化玉器的特点

崧泽文化约历经六百年,出土玉器的形制和种类具有长江中下游地区玉器普遍的特征,其基本特征有:

1.开始以透闪石软玉为主体,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化;

2.璜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器种,片形璜逐渐占据了显要的地位,不规则的片状坠饰占有相当的数量,说明制作技术在玉料获取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加工大面积玉件的切割技术取得了重要突破;

3.出现少量的条形、扁环形环镯和环璧,但数量远不如凌家滩同类玉器;

4.玉钺等大型礼仪性玉件开始少量出现;

5.墓地出土玉器的数量、种类和质量已经成为墓葬和聚落等级的标识;

6.晚期墓葬出土玉器的改制现象特别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

(一)璜是最为重要的玉器

璜是崧泽文化最为重要的玉器,也是这一阶段平面展示面积最大的玉器,多位于墓主的颈胸部位,作为项饰。就其形态而言,可分为条形璜和片形璜。条形璜已非常少见,且截面多为扁圆形;片形璜可细分为桥形、半壁形和少量的异形璜。

1.线切割技术的成熟和大型片形璜出现

大型的片形璜出现在崧泽文化晚期,虽然个墓出土数量远逊于凌家滩墓地,但就整个长江流域而言,却是太湖流域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玉器。

关于线切割技术的成熟和大型片形璜出现的逻辑关系,已有研究者详细论述。崧泽璜体的切割基本为线切割^[6],如崧泽M91:3(彩插四:3)。璜体基本都有正背面之分,正面的边缘往往呈斜杀面,可以基本确认为片切割痕,说明璜的外缘成形如同良渚玉璧,其外弧轮廓也是多次片切割而成。事实上,多数的璜体外缘也非正圆,所以,可以排除一些学者提出的璜体外缘成形有所谓的“旋截”工艺^[7]。

无论片璜的形态有多复杂,其内凹缺和外缘均保持着基本的圆弧,而半圆形内凹缺有管钻,也有线切割而成。如崧泽M65:9和M64:5就有管钻和线切割所形成的凹缺(彩插四:4)^[8]。

2.锯齿璜的出土地点似乎有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

锯齿璜在凌家滩玉器中非常瞩目,除了外缘

切割呈锯齿状外,还有出廓璜。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阶段也有此类璜的出土报道,但数量上似乎有由西向东递减的趋势,由此我们可以断定环太湖地区的锯齿璜应是受到了凌家滩玉器的影响。如浙西北的安吉安乐遗址,除了锯齿璜,另一件璜外缘尖凸,内缘呈“~”形,明显具有凌家滩-薛家岗相关玉器的风格(彩插四: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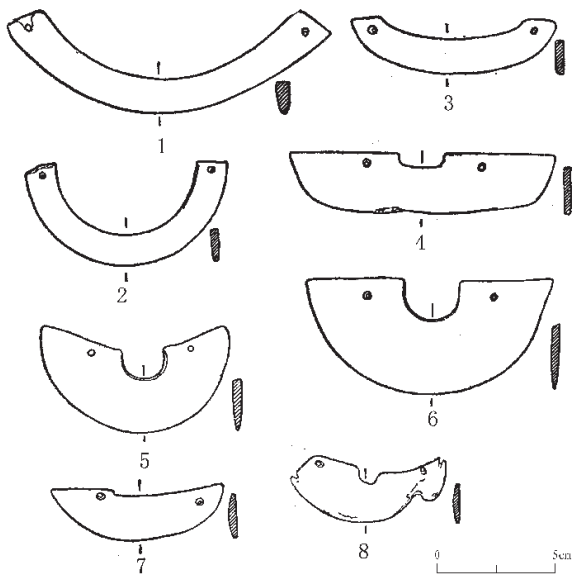
3.片形璜形式多样,出现异形璜

环太湖地区目前没有发现类似凌家滩玉器那样在璜的一端雕琢兽头的条形璜,但是仍出现一些异形璜,这类璜体往往整体似动物造型,或另雕琢动物造型。

崧泽第一、二次发掘的100座墓葬中璜共18件,其中弧条形璜(含似桥形)5件,片状的桥形璜2件,而片状的半壁形璜达9件,另2件为似鱼鸟形的异形璜,基本上反映了崧泽文化阶段璜的特征。如崧泽M62:2璜,整体似鱼形;崧泽M64:5璜,整体似鸟形^[10](图一)。同里采-1璜,“穿空处雕成两只相背的鸟头”,也很值得一提^[11]。这些璜或整体选取某种动物的造型,或部分选取某种动物的局部特征,丰富了璜的内涵。

(二)出土少量环璧

环璧是凌家滩的重要玉器之一,崧泽文化也多有出土,外径也多在4~5厘米,分布地域也广,



图一// 青浦崧泽第一、二次发掘出土的璜

1~3.条形璜(M59:13、M60:6、M62:3) 4.桥形片璜(M92:5)

5~6.半壁形璜(M65:9、M97:11) 7~8.异形璜(M62:2、M64:5)

数量却是不多,且目前尚无出土等距分布多系孔环璧的报道。在崧泽墓葬中,小环璧多为单件,位置也多样。如崧泽M82:10,外径3.7厘米,报告定为口琚;上海青浦福泉山M24:5,外径4.5厘米,“发现于头骨左前方一堆杯、盆、壶等陶器的南侧,部位与崧泽遗址M65所见相似”^[12];昆山墓地出土有3件,大致位于墓主胸腹部位,其中M12:2和M58:11均管钻成形,后者在一侧边缘还钻有一系孔,形同浙江余杭瑶山所出^[13],应是作为一类仅次于璜的重要饰件。

发展到良渚文化时期的环璧,则被今之反山、瑶山发掘者根据墓内出土物的组合情况,定名为“圆牌”^[14]。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环璧就阙如消逝了。良渚文化璧的起源应该与这类环璧类玉器有关。

(三)不规则几何形片状玉坠和改制的片状玉坠在崧泽玉器上占有较大比例

崧泽文化时期出土的玉器就绝对数量而言,不规则几何形片状玉坠占有较大的比例,以崧泽文化边缘地域的宁镇地区北阴阳营墓地为例,扁平的、一端钻有系孔的不规则形玉坠就出土有37件^[15]。南河浜虽然没有细致地描述少量片状玉坠改制的可能,但是形式确实多样,如梯形、舌形、三角形、圆

片形、圆环形、半圆形方环行等等,报告认为“一般采用单体成形的片状加工工艺”,“这与本地区崧泽文化之前马家浜文化玦饰的制作过程,具有相似之处”^[16]。这些玉坠自然不是废料或边角料再加工,说明这一阶段切割技术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掌握玉器平面的延展性,为其后制作平面展示面积较大的玉器奠定了技术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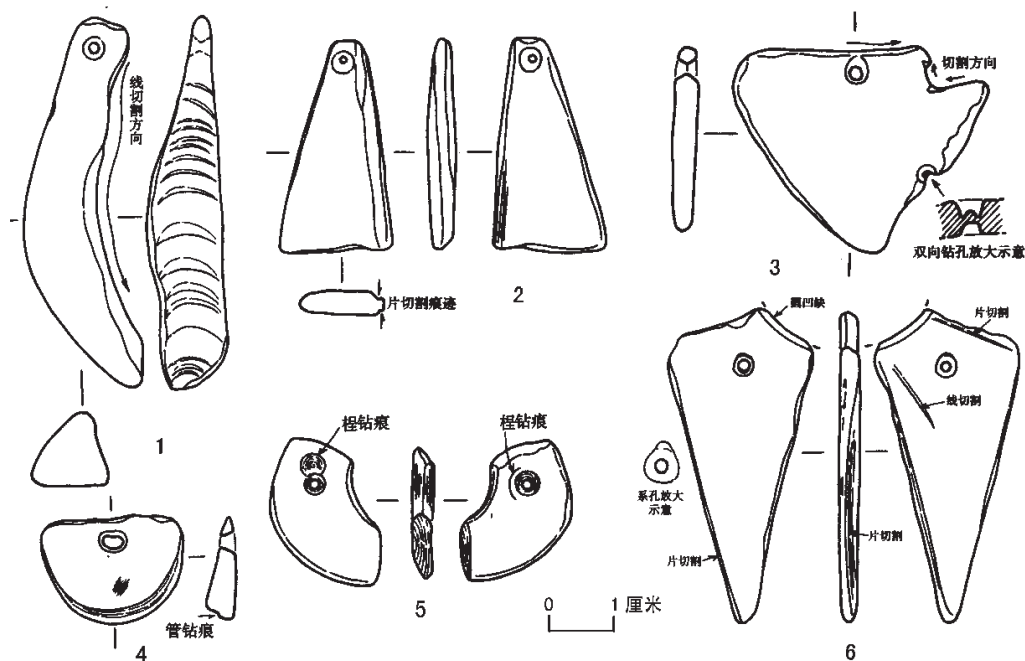
当然,崧泽文化时期还有相当数量的改制片状玉坠。对昆山等出土玉器的观察可知,除了不规则几何形片状玉坠外,边角料和玉器残损后的再利用的情况也较常见,如:

1、制玉过程中的边角料再利用。昆山M5:3,除内侧面留有线切割痕迹外,外缘及两面保留了玉料的原生状态。

2、制玉过程中废料的再利用。昆山M10:4,从竖截面厚薄判读,该器可能是制作璜内圆后的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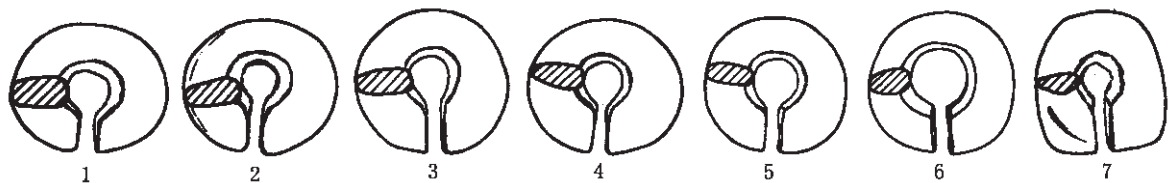
3、玉器残损后再利用。昆山M9:3,其一端切割面特征显示原先这一玉坠应为玦;而昆山M30:2,显然是残璜改制后的玉坠;昆山M46:3玉坠原应取之于一件较大面积的片形璜(图二)。

关于玉器残损后的再修补、利用,例子也有少量。如南河浜M96:5缀合环璜,与凌家滩、北阴阳



图二// 湖州昆山出土的利用玉器边角料和残件改制的各类玉坠

1.M5:3 2.M5:2 3.M30:2 4.M10:4 5.M9:3 6.M46:3



图三// 海盐仙坛庙出土玉块

1.M129:1 2.M129:5 3.M9:2 4.M83:8 5.M83:7 6.M119:1 7.M84:1

营等出土的缀合璜性质上明显有别,属于正常现象,同时也说明这类玉器应是墓主生前所用。

(四)作为耳饰的块在崧泽文化早期之后渐渐阙如

如果说马家浜文化时期块还作耳饰之用,早期形态仍保留着球管形和饼壁形,那么到了崧泽文化阶段,作为耳饰的块便渐渐阙如了。如南河浜92座墓葬出土64件玉器,块仅2件;而崧泽第一、二次发掘的100座墓葬、同里64座崧泽文化晚期墓葬,均未出土块;新近我们发掘的浙江海宁小兜里崧泽文化晚期墓葬中出土的玉块均位于墓主胸腹部位,已经彻底告别了耳饰块的功能。

少量崧泽文化早期块工艺上还明显带有马家浜文化的特征。仙坛庙遗址崧泽文化早期墓葬中有6座出土6件块,皆饼状,除M84:1呈青绿色外,均白色玉髓质。王宁远先生根据质地和形态将之分为三种:第一种平面略呈椭圆形,其中M83成对出土于头骨两侧耳朵部位,而M129的两件则分别位于头顶外侧和盆骨部位,说明作为耳饰的功能已有变化;第二种平面略呈圆形,其中M119:1出土时位于头骨右侧,“豁口朝下”;第三种平面呈不规则的圆形,其中M84出土时位于墓葬的中部,显然也已不作耳饰之用(图三)。

这些块的外周都不圆整,无疑不可能是管钻成形。发掘者研究块中孔孔壁痕迹时,观察到“孔壁的一周往往由不连续的短弧面构成,各短弧面宽窄长短不一,圆心角都不超过 180° 。同一水平位置的每个短弧面与块体平面的倾角各不相同……此种痕迹与双面管钻或实心钻形成的痕迹判然有别”^[17]。

崧泽文化的一些异形块非常有特色,可以作为玉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重要载体之一。如余杭良渚石马斗M32出土的夹子样块和M55弯钩形块,尤其是M55出土的一对,“弯勾状,扁平体,外形略呈梯形”^[18],其勾体的一侧微微内凹,形同龙

弧凸的额部和前伸的吻部,颇与龙形块接近。

(五)耳珥(耳栓)显然受到了凌家滩玉器的影响

蘑菇形的纽扣状耳珥是凌家滩墓地的典型玉器,也见于江苏高邮龙虬庄M140出土的骨质同类器^[19]、海安青墩M95的一对“小骨环”^[20]。崧泽文化这类数量极少的耳栓应该是受到了凌家滩玉器的影响,如崧泽M127:3的“小玉器”^[21]。

(六)半球形隧孔珠

半球形隧孔珠也是崧泽文化的典型玉器之一,有弧凸正面和平整背面的隧孔,也分别见于红山和凌家滩,其背景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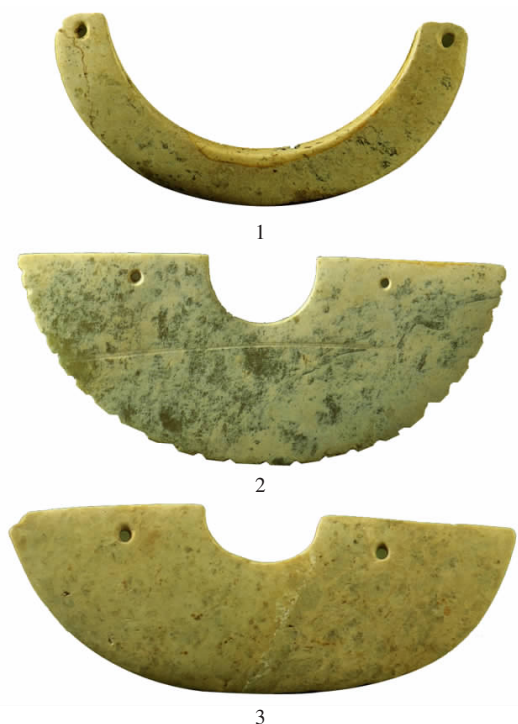
这种珠仅在崧泽文化晚期出现,部分出土时位于头端部位,如南河浜M48和M55;海宁九虎庙M6的隧孔珠紧附在墓主耳廓部位(彩插四:1)^[22];而另一些则位置多样,显然不作耳饰之用。

在反山、瑶山等良渚显贵大墓中,凡出土时为一对的隧孔珠,往往位于墓主头端部位,或另有小玉珠与之配伍;而多件者则位置不一。良渚时期的隧孔珠形态更为多样,有半球形、球形等。从早期的半球形隧孔珠形态分析,供缝缀的背面平整但不打磨光亮,而弧凸的正面打磨多甚为光亮,若作为耳饰,肯定要通过一个软性的诸如丝类进行串系,更何况还另有小珠与之配伍。所以这一玉饰还不能简单地定性为“璜”。

崧泽文化时期的隧孔珠基本为半球形,极少如南河浜M55:1呈“圆柱状”,但正面倒也是有意弧突^[23]。球形隧孔珠要到良渚文化时期才出现,这或许与球体的“倒棱”工艺水平提高有关。

(七)出土“琰”的墓例大大增加

最早判读新石器时代有玉质琰的是崧泽第一、二次发掘,出土琰3件,有圆形和鸡心形(鸡心形也见于江苏江阴南楼M7),均有穿孔,“都发现于口中”^[24],如M10墓主“口中有玉琰一件”^[25]。黄宣佩先生认为玉琰可以追溯到马家浜文化时期,如



图四// 南京江浦营盘山出土玉璜

1.M11 2.M30 3.M23

崧泽遗址马家浜文化的M163的“管形玉琰”,以及江苏金坛三星村M925、M860A出土的所谓“出土头骨口内”的琰。黄宣佩先生还特地提到了崧泽M60:10琰是“在人骨从墓中取出整修头骨时,才在口腔内发现”^[26]。

现在看来,一些人骨没有保存但能大致判断头向的崧泽墓葬,其头端部位出土的小玉器很可能为口琰,这样一来,墓例的数量可能会大大增加。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佩戴品,与后世专门制作的玉琰有别,如南河浜M27:3“变体形式”的玉璜^[27]等。但无论如何,新石器时代玉琰的确认对于研究这一葬俗的起源无疑具有一定的意义。

(八)玉钺开始出现

相对于凌家滩玉器而言,崧泽文化明确的玉钺仅发现数例。

如南河浜出土2件,其中M61:8,“透闪石软玉”^[28],长15.2厘米,呈横向位于成年男性之盆骨部位。M61共出有算珠柄台形圈足豆,属于墓地“晚1”阶段。而M68:2,“灰白色,隐见绿质,为叶蛇纹石”^[29],属于墓地“晚2”阶段。

距离南河浜仅25公里的仙坛庙崧泽文化早期

M43出土玉钺2件,此墓是该遗址30余座崧泽文化早期墓葬中唯一的二次葬墓例,玉钺形制为舌形弧刃,“似皆为透闪石软玉”,“推测可能是在安有木柄的情况下有意从侧面击打为两段的”^[30]。

新近公布的江苏吴县草鞋山M28一件半孔玉钺也归属到崧泽文化时期,其形制明显具有良渚文化玉钺的特征^[31]。

(九)“软玉”占据崧泽文化玉器的主导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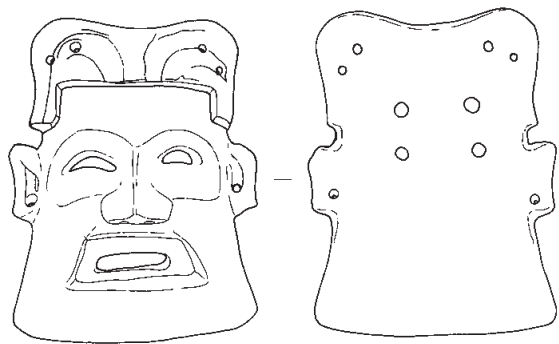
如果说以金坛三星村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的玉器质地还颇为庞杂,那么到了崧泽文化时期,“软玉”在数量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可与凌家滩玉器互相彰显,而且随葬石器尤其是石钺的质表抛光也越来越追求镜面般的效果。

南河浜玉器的地质考古学研究为我们整体分析和统计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14件具有代表意义的样本,除M11:1块为石英类假玉、M24:13纺轮为叶腊石+绢云母类假玉、M68:2钺为叶蛇纹石假玉以及M55:1为石英+透闪石类半玉外,余均为透闪石软玉(Nephrite)。样品测试表明,“南河浜玉器中的许多软玉制器,其软玉质量明显优于一般良渚文化的玉璧及高琮”^[32]。

二 宁镇和古芜湖地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玉器的地位和意义值得关注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虽大致可分为江淮、宁镇、环太湖和钱塘江以南等区块,但江淮西部至于长江、宁镇以及环太湖这三个区块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个令人困扰的话题。如对于北阴阳营墓地文化属性和相对年代的认识就一直有争论,笔者倾向于将北阴阳营和三里村墓地的相对年代推定为约当于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然而从玉器出土的情况看,这两处还不甚典型,如片形璜似乎仅有三星村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更没有锯齿璜的出土。而南京江浦营盘山、句容城头山以及丹阳磨盘墩等遗址的发现使得我们要重新考虑宁镇地区这一阶段的玉器发展应绝非仅是停留在块、条形璜这一阶段。

前些年,江苏的考古工作者结合高淳薛城等遗址的发掘,提出了古芜湖文化的概念^[33],即长江下游南岸,在古代除了太湖之外还有“丹阳大泽”(或称“古丹阳湖”),它汇聚了源于今皖浙交界天目山及皖南山地的多条水系而泻入长江,形成了一个地域广袤而又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薛城遗址的发掘者进而提出这一区域可能是一种新的考



图五// 南京江浦营盘山出土的戴冠陶塑人像
(摹自南京博物院展品)

古学文化类型——“薛城文化类型”^[34]。

(一)江浦营盘山——联系凌家滩和宁镇地区的纽带

长江北岸的江浦营盘山发掘成果非常重要,从公布的零星玉器可以发现,营盘山不但出土条形璜和片形璜,片璜中至少有两件以上的锯齿璜,其中M30出土的锯齿璜之一面留有明显的片切割痕迹(图四),在一未标注编号的串饰上,甚至还有小系孔环璧^[35],玉器的整体风格显然属于凌家滩系统。

除此,还“发现过一件可以和红山文化女神头像媲美的陶质人头像,其风字形冠的纹饰和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头部的卷云纹带相同。该塑像头顶留有小孔,推测可在插羽或披茅之后形成冠冕”^[36](图五),足见该遗址的重要。

(二)马鞍山烟墩山的玉人——崧泽的陶器和良渚的玉器

2004年在马鞍山玉山区烟墩山清理了9座新石器时代墓葬,其中M9出土1件“人首形玉饰”(图六);M10出土2件环状玉璜(即弧条形玉璜)和1件半圆形玉璜(即半璧形璜);M16有筒形玉镯和玉锥形器等。从已经公布资料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库房陈列所见,墓地出土陶器(未知具体单元)确实属崧泽文化阶段,M16锥形器也具有良渚文化早期截面近圆形,端部不出榫的特征^[37]。这样的发现非常重要。

(三)高淳朝墩头的“玉组合器”——人像和鸟兽面

1989年发掘的朝墩头遗址位于江苏高淳固城湖东,遗址第4、5层“时代与良渚文化早期接近。发现灰坑7个、墓葬17座……M12(崧泽晚期)所出土

的一件人形玉雕,使人们首次见到了宁镇远古先民的服饰情况”^[38]。发掘者认为:M12是当年发掘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中心墓葬,以“M12为中心分布排列”的其它墓葬计14座,“结合墓葬出土器物的排队分期,可分两段,前段为崧泽至良渚文化过渡期,以M10为代表;后段为良渚文化早期,以M12为代表”^[39],从附图中陶壶、陶豆的特征可知,M12的时代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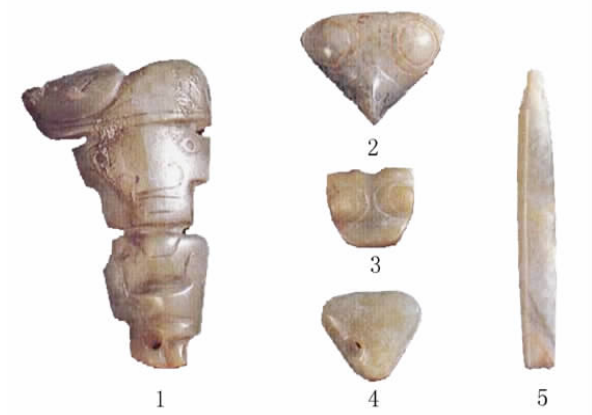
M12共出土随葬品17件(套),玉器除了位于墓主头骨之下的一组由17枚单件组成的“玉组合器”外,另有镯、环、坠和珠等。其中玉组合器“出土时位置已略有错乱,现拼合复原……”。笔者虽不赞同这类缺乏细致野外原始记录的复原形式,因为极易引起误解,但是人像以及兽面、鸟面、三角形饰的工艺地位非常重要。人像之冠帽结构和整体造型均不见于良渚文化,自身特征鲜明,而鸟兽的重圈眼雕琢似乎又具有良渚文化早期玉器的风格(图七)。

(四)句容城头山的亦人亦兽玉饰

1983年发掘的句容城头山遗址在点将台文化之下清理了打破生土的新石器时代墓葬35座,张敏先生在后来的讨论中提到:“35座墓葬的年代均晚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4层墓地和居地,大致相当于崧泽文化晚期,抑或可达良渚文化早期。”^[40]13件玉器虽然不多,而且也仅发现于4座墓,但形制、工艺特征以及所处地域和文化属性却十分重要。其中M43:2“玉人”(兽面纹玉饰)尤甚,弦纹冠上的圆弧形外廓结合未钻穿之管钻痕显然是有意



图六// 马鞍山烟墩山出土的人首形玉饰(高3.5厘米)



图七// 高淳朝墩头 M12 出土的“玉组合器”之部分器物

1.人像 2.鸟面 3.兽面 4.三角形饰 5.坠饰

所为,而且管钻痕恰如重圈(彩插三:2);弦纹冠也见于江苏昆山赵陵山 M77 “镂空人兽复合玉挂件”,甚至弦纹数都是三道;张敏先生认为圆形眼睛的刻划是定位打稿,但或许已是微雕线刻的雏形;鼻端形态的雕琢最接近良渚玉器兽面纹,而与凌家滩玉人写实之鼻部断然有别。这类亦人亦兽的玉件若再有出土,势必会更引起宁镇与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期琢玉工艺的深层次思考。张敏先生高度评价城头山玉器,认为长江以南是宁镇地区最先认识透闪石软玉,兽面纹玉饰开了良渚兽面纹的先河,小璧已具备了良渚玉璧的功能等,进而认为宁镇地区古文化原先与太湖地区史前文化同步,是崧泽文化中期之后向周边地区扩张,最终导致衰落,“良渚文化发达的玉器是以牺牲宁镇地区史前文化为代价的。即宁镇地区史前文化的毁灭,铸就了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辉煌”。良渚文化时期的宁镇地区情形如何?宁镇地区作为与皖江交流的中介,环太湖和皖江流域的先民不会仅仅选择溯长江而上,或者经过长兴—广德的皖浙通道而避开该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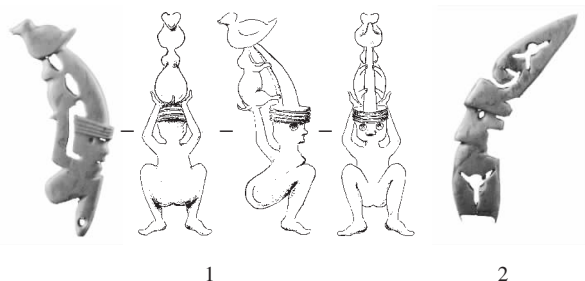
三 苏南—沿江地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玉器——传播还是传承? 需要继续研究

长江下游的苏南—沿江地区从马家浜文化开始就显示出与太湖西南—东南地区分属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这一地区出土了一些颇具特点的玉器,这些玉器造型独特,以线切割或搜括为主要成形工艺,在之后的良

渚文化时期少见或基本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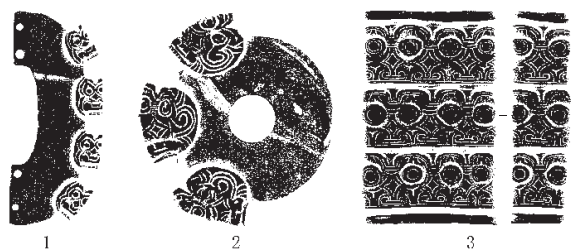
如赵陵山 M77 “镂空人兽复合挂件”(M77:71)和江苏吴县张陵山 M5 “玉觿”,也可归为“玉人”。赵陵山的玉人,姿势夸张,上肢向后伸展、双手托举兽臀,兽吻又顶着蹲踞于玉人冠顶之鸟,有学者曾将其上人、鸟、兽与琮的人、鸟、兽纹样联系,不无道理^[41]。又,此件玉人将立面形式转换为两侧对应的扁平状,也是玉器视觉艺术的突破^[42](图八)。两墓虽属于良渚文化早期,但这类玉人在之后的良渚文化玉器中不见,势必另有源头;玉人形态迥异,与以神人兽面像为主体的良渚文化玉器断然有别,自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只是目前对其地位和意义尚不明了。

除此,江苏常州新岗和张家港东山村发掘是新近这一阶段玉器考古的重要发现。2008~2009年新岗遗址清理了崧泽文化墓葬18座,其中以 M109 最为显要,石钺高达37厘米,完全是凌家滩遗存的风格;M105出土的“玉蛙形器”以线切割成形,依稀可见薛家岗—鼓山琢玉风格^[43]。2009~2010年的东山村遗址“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规模巨大,清理的区27座墓葬年代跨越崧泽文化早、中、晚期。区8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中玉器的数量“最多有19件”,其中 M90 有陶、石、玉质随葬品56件,玉器有镯、璜、玦、耳珰等,又有一长约34厘米的石钺,发掘者将 M90 的年代“初定在崧泽文化早期”;M91 则是一座出土玉钺的大墓,时代在“崧泽文化中期,或者略微偏早”。发掘者把“M92 的锥形玉饰、M93 内的钥匙状玉饰、‘G’形玉饰、M96 内的鱼形玉饰”视为新造型的玉器。虽然,笔者不认同东山村遗址“为良渚文化高度的社会文明找到了源头”,但是,发掘者推定它“与皖江平原和宁镇地区的史前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资料”^[44],这个认识非



图八// 昆山赵陵山 M77 和张陵山 M5 的玉人及展开示意

1.赵陵山 M77:71 玉人及其展开复原示意 2.张陵山 M5



图九// 瑶山玉器龙首纹

1.璜(M11:94) 2.圆牌(M11:59) 3.长管(M10:21)

常恰当。

四 崧泽文化晚期玉器可能还有我们未认知的一面——瑶山、反山早期玉器给予的重要启示

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早就是多数学者的共识,尤其是继莫角山之后“良渚古城”的系列发现,然而对作为中心遗址的显贵墓地——反山、瑶山墓地年代的认识却并非一帆风顺。原因与20世纪80年代浙北地区良渚文化墓葬分期初步建立时候缺少良渚文化早期的资料有关,也与反山、瑶山墓地玉器特征的复杂性有关,所以,虽然早在1989年中村慎一研究玉琮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瑶山M9应该为良渚文化的早期^[45],但是大家并未十分重视。随着之后良渚庙前、浙北相应遗址的发掘,特别是瑶山陶器的公布,瑶山墓地早期的年代可以推至良渚文化最早期的认识得到了证实^[46]。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之前仅仅拘泥于良渚显贵墓葬中的琮、璧、钺的组合,而瑶山和相应的反山早期玉器主要特征是什么?无疑,玉器的刻纹和形态是这一方面的重要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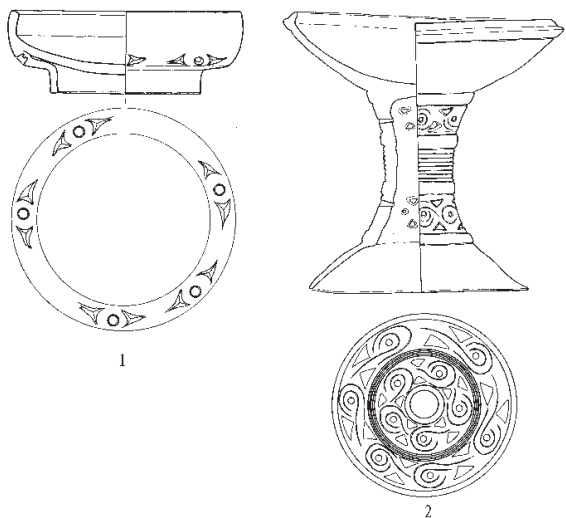
以反山M12:98玉琮的直槽和节面为代表的“神人兽面像”、神人兽面像图案是良渚文化玉器成熟阶段的唯一图像形式,也可以说贯穿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始终,主宰了几乎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

“龙首纹”是反山、瑶山发掘对于玉器的重要认识之一,以瑶山M11:94璜和M11:59圆牌周缘雕琢的图像为代表,研究者还进而认识到类似瑶山M9:5管、瑶山M10:21长管上的刻纹应是龙首纹的图案化^[47]。之后,随着浙江桐乡普安桥M8等多处遗址的发掘,尤其是一些单体的龙首纹玉件的出土,表明哪怕是象瑶山M11:59圆牌的龙首纹,也已经是处于了图案化的阶段,而瑶山M10:21长管的龙首纹的图案化更接近抽象(图九)。这一现象说明,在良渚文化早期“龙首纹”的图像已经超越了形象的立体圆雕,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之

前,笔者曾在关注红山文化“玉雕龙”与良渚文化早期龙首纹的刻纹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龙首纹不但与神人兽面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作为兽面像主要部分的兽面重圈大眼两侧斜上方的月牙形“眼睑”实际上应该是龙首纹耳朵部位的子遗。如此一来,作为良渚文化早期玉器代表的龙首纹的发展期肯定早于良渚文化的早期阶段。《昆山》报告的相关章节分析了崧泽文化阶段“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的意义,在具体论述兽面纹眼睛时阐述了瑶山M7:55和反山M16:3牌饰纹样的意义,“陶器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与玉器兽面纹的重圈和尖喙组合眼”^[48],只是,目标指向仍嫌含糊,图像演变的逻辑关系也缺乏进一步的举例论证(图十)。

不过,瑶山M7:55和反山M16:3牌饰纹样确实已不是单纯的“亦龙亦兽”了,尤其是在瑶山M7:55的层次分明的拓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崧泽文化阶段典型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成为了这件玉器图案的眼睛(图十一)。

不仅如此,观察神人兽面像的兽面眼睛部分



图十// 崧泽晚期阶段陶器上的圆和弧边三角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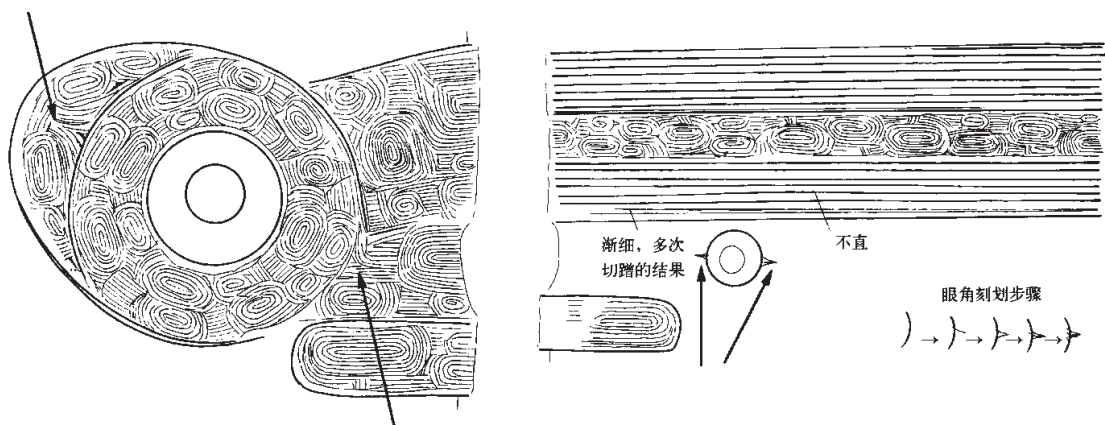
1.昆山 M13:9 2.昆山 M9:10



正面

背面

图十一// 瑶山 M7:55 牌饰的刻纹



图十二// 反山 M12:98 玉琮节图案兽面纹和神人眼睛两侧的尖喙(箭头所示)

也可以发现,重圈眼睛的斜上下方往往添刻有小尖喙,这一小尖喙以多道刻划重叠、加深的线条组成,应该是圆和弧边三角眼睛的子遗。实际上,所谓“神人”的眼睛也是如此,《反山》报告中关于 M12:98 玉琮节面图案兽面纹和神人眼睛的细部工艺特征清晰地表述了这一内容(图十二)。目前,学术界对此已有更为系统的论述^[49]。

我们有理由推测,不仅神人兽面像的图意与崧泽文化阶段的圆和弧边三角组合图案(的符号化)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在崧泽文化晚期阶段,除了我们已知的单体龙首纹玉雕外,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神人兽面像的雏形,类似瑶山 M7:55、反山 M16:3 牌饰那样的刻纹玉器和刻纹图像绝对不会是孤例。

五 余论

从 1957~1958 年邱城九座墓葬的发掘到崧泽中层墓地的揭示,以及最后崧泽文化的命名,崧泽文化的考古工作实际上沉寂了颇长的时间,直至 1996 年南河浜的考古发掘,之后,仙坛庙、安吉芝里、昆山、同里以及尚未详细公布资料的常州新岗等的发掘揭开了崧泽文化考古的新面貌。

对于作为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遗址群,学术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曾认为这里的崧泽文化堆积不甚理想,即便象吴家埠 M19 那样墓葬单元的陶器特征,判读上也有过非此即彼的犹豫^[50],而对良渚庙前良渚文化早期墓葬的认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欠缺。原因自然与当时建立浙北小墓分期时的资料尚有一定缺陷有关,也与对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有先入为主的思维有关。

《瑶山》报告公布后,瑶山 M9:80、M4:45 等豆

盘的形态以及标识良渚文化早期特征和女性性别的特别陶器——过滤器,可以在庙前良渚文化早期墓葬中找到对应。与此相关,2004 年我们在昆山发掘了一批假腹圈足盘和粗泥陶甬形足鼎、盂组合的墓葬,而同样的圈足盘在良渚遗址群不但没有盂的伴出,且鼎为夹砂鱼鳍足鼎,更为重要的是,这类作为庙前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典型器的圈足盘似乎有往沪嘉地区递减的趋势,后者同时期豆盘的主要形态则是台形(或称为鸡笼形)圈足。

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无论在玉器工艺还是聚落集群的规模上都鹤立鸡群于周边地域,从良渚文化早期以瑶山为代表的显贵墓地到晚期的莫角山“良渚古城”,碳十四年代跨度从距今约 5300 年或稍晚,至距今 4200 年前后,说明在良渚文化阶段良渚遗址群自始至终都占据了中心地位,因此良渚遗址群的兴衰过程对于良渚文化谱系年代自然就最有代表性。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良渚遗址群的聚落规模和聚落结构,而作为当时最高等级聚落群中的工艺水平,尤其是玉器的工艺水平,自然也是良渚文化工艺水平的最高代表,所反映的精神世界领域更是当时观念形态的权威代表。良渚文化承接本地地区的崧泽文化而来,很多学者在关注巢湖地区凌家滩玉器时,认为凌家滩玉器或许是良渚文化玉器的源头,也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宁镇地区早于良渚文化阶段发达的玉器工艺,如南京北阴阳营墓地出土的以璜、玦为代表的玉器工艺。不过,诚如本文提到的反山、瑶山早期良渚文化玉器给予的启示,或许,现阶段对于崧泽文化玉器的认识还远远未达到真正的层面。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在新石器时代,体现

观念形态的工艺的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的传播,不太可能存在单向的透过工艺层面体现观念形态的传播,只有彼此之间的交流,除非是该共同体迁徙或被灭绝,对区域内单线进化的文化谱系而言,更多的当然是传承和在传承基础上的突破和演变。只有这样,我们在看待早于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玉器时,研究的视角或许可以更加开阔一些。

补记:此文写成后不到一周,12月27日,承海宁瑞寺桥遗址发掘主持杨卫先生在野外现场惠告,崧泽晚期大型墓M16于墓主额头部位出土了“圆和弧边三角玉器”一件。我相信,这样的发现仅仅只是一个开头。

2010年12月22日于方家洲遗址。

- [1]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1959),《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977年南京会议参见《文物》月刊通讯员:《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集刊》(1),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
- [3]宋建:《关于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几个问题》,《考古》2000年第11期。
- [4]张照根:《试论龙南文化》,古方、徐良高、唐际根编:《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 [5]中村慎一:《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5页,“以夹细砂鱼鳍形足鼎的出现与崧泽文化相区别”。
- [6]良渚时期玉璜和玉钺体留下的片切割也非常少见,如仅有瑶山M11:83璜、瑶山M9:14玉钺等数例,而这些片切割痕迹也还有前期工艺所留的可能。
- [7]台北故宫沈建东认为如湖南华容毛家村小溪文化M113璜的那些痕迹就是旋截工艺所留。参见沈建东:《长江流域史前玉璜制作工艺初探》,(台北)《故宫文物月刊》(269)第23卷第5期,2005年8月。
- [8]图片采自上海博物馆编:《上海考古精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崧泽M91玉璜编号和相关认识也可参见张明华:《崧泽玉器考略》,邓聪编《东亚玉器》Vol.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年,第241~250页。
- [9]安吉县博物馆:《安吉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9、20页。
- [10][24][25]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36、14、16页。
- [11]苏州博物馆、吴江博物馆、同里文保所:《江苏吴江同里遗

- 址发掘报告》,苏州博物馆编:《苏州文物考古新发现》(苏州考古发掘报告专辑2001-2006),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 [12]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昆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报告结语部分有关“圆牌”数量有误,在此更正。
-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余杭反山发现良渚文化重要墓地》、《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 [15]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 [16][23][27][28][2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87、192、117、126、303页。
- [17][30]王宁远、顾晓峻:《崧泽早期玉器的几个特点——从仙坛庙出土玉器谈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二届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专辑)第六辑,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07、108页。
- [18]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浙江》,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 [19]南京博物院:《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42页图六〇。
- [20]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 [21]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4-1995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 [2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资料。
- [26]黄宣佩:《新石器时代玉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24页。
- [31]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江苏 上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 [32]闻广:《南河浜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中国古玉地质考古研究之九》,《南河浜》第413页附录一〇。
- [33]张敏、王志高:《薛城遗址的发现与古芜湖文化区》,《中国文物报》1998年7月8日。
- [34]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高淳县文管所:《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薛城文化层出土遗物与北阴阳营接近,尤其是M100:7分体缀合的条形饰,目前也仅见于北阴阳营墓地。
- [35]将“江苏史前玉器”归到“物质文化”进行介绍的《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112页图五十一“宁

- 镇地区史前玉器第二阶段”有部分和《中国玉器全集·原始社会》大致相同的南京江浦营盘山出土玉器线图。
- [36]牟永抗:《良渚文化玉器·前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0年。
- [37]叶润青:《安徽马鞍山烟墩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至西周文化遗存》,《中国文物报》2004年6月11日。
- [38]谷建祥:《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第202~203页。
- [39][41]谷建祥:《人·鸟·兽与琮》,南京博物院《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第391~393、393页。
- [40]张敏:《句容城头山遗址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东南文化》2001年第6期;费孝通主编:《玉魂国魄——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 [42]江苏省赵陵山考古队:《江苏昆山赵陵山第一、二次发掘简报》,南京博物院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赵陵山玉人立体示意图为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博士梁丽君绘制。
- [43]黄建康等:《常州新岗遗址发掘为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研究再添新资料》,《中国文物报》2009年11月20日。
- [44]南京博物院等:《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29日。
- [45]中村慎一:《中国新石器时代の玉琮》,《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1989年12月。
- [4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庙前》,文物出版社2005年;方向明:《反山、瑶山年代问题的再讨论》,浙江省博物馆《东方博物》第二十七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反山、瑶山资料参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反山》,文物出版社2005年。
- [47]刘斌:《良渚文化的龙首纹玉器》,杨伯达主编《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 [48]方向明:《良渚玉器刻纹研究之一——眼睛(球)的发端》,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编著:《玉文化论丛》(2),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9年。
- [49]梁丽君:《良渚玉器兽面纹大眼的再研究》,《新美术》2010年第6期。
- [50]参见王明达在吴家埠简报后的附录文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吴家埠新石器时代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报》(建所十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On the Jades of Songze Culture and the Relatives

FANG Xiang-ming

(The Zhejiang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4)

Abstract: The shape and type of Songze Culture jades share some common features with those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Yangtze River; The jades excavated in Nanjing-Zhenjiang area, the ancient Wuhu area should get more concern because of their significance; The jades in the period of early Songze Culture to late Liangzhu Culture from the south Jiangsu and the area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should get further research on their feature of transmission or inheritance; To study the jades from Fanshan and Yaoshan sites would probably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the unknown subjects about the jades in the late stage of Songze Culture.

Key words: Songze Culture; jade

崧泽文化玉器出土位置及琢玉工艺



1.海宁九虎庙 M6 隧孔珠出土位置



2.兽面纹玉饰(句容城头山 M43:2)



3.线切割痕(崧泽 M91:3)



4.璜内凹缺管钻痕(崧泽 M65:9)



5.尖凸外缘璜(安吉安乐 1996 年出土)



6.锯齿璜(安吉安乐 1996 年出土)

3、4 采自《上海考古精华》48、50